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倒计时50天——

对体育政治化说“不” 还冰雪一片纯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子倩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2年2月4日开幕，届时，奥运火炬将在中国北京再次点燃。“此次全球体育盛会将永久改变冬季运动的面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表示，“中国已经准备好了欢迎来自全世界的顶尖冬季项目运动员。”

12月15日，北京冬奥会进入最后50天倒计时。各国冬奥健儿在陆续来京参加测试赛后，目前已全部顺利出境，进行最后的备战冲刺。大部分赛事筹办人员已进驻场馆，赛事演练工作有序开展。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日前称赞说，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始终保持密切沟通，赛事筹办工作进展极其顺利。

当地时间12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证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出席北京冬奥会。图为古特雷斯11月24日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发表讲话。 人民视觉供图

10月18日，希腊，2022北京冬奥会圣火采集仪式举行。 视觉中国供图

国际社会关注和力挺北京冬奥会

全球冬奥热情持续高涨。国际社会各界纷纷通过不同形式，表达对“冰雪之约”即将到来的热切期盼。

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国家奥委会公开表态支持北京冬奥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国家政要，均已确认将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韩国、法国、芬兰、保加利亚、希腊、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白俄罗斯、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等国奥委会官员都表示，期待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崔钟建特别提到，“平昌、东京、北京的东北亚奥运接力意义深远。韩国作为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东道主，将发挥自身作用。”二十国集团（G20）、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也都发出支持北京冬奥会顺利举办的有力声音。

在11月底举办的第二次外国驻华使节奥运情况介绍会上，来自70余国的约120位驻华使节、高级外交官及国家（地区）奥委会代表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与会。荷兰驻华大使贺伟民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北京冬奥会成为进一步深化中荷两国合作的契机，“特别是激励两国年轻人更加热爱冰雪运动”。

海外媒体正密切跟进北京冬奥会的动态。德国电视一台日前宣布，该台对于北京冬奥会报道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关注北京冬奥会的疫情防控措施，称“中国正计划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周全的预防措施”。南非主流媒体独立传媒集团网站刊文表示，“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完美诠释了绿色低碳、环保创新理念与奥运精神的结合，将创造奥运历史的多项纪录。中国定将呈现一届非凡卓越的绿色冬奥、科技冬奥盛会。”3个月前，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正式对外发布时，路透社、加拿大广播公司等多家外媒都进行了相关报道，认为这与“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相契合。

借冬奥会搞政治算计者沦为“圈地自嗨”

12月2日，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会员国共提该决议。决议表示，北京冬奥会将是展现人类团结、韧性和国际合作宝贵价值的契机，特别强调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愿景——“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这份协商一致通过并得到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共提的决议显示，纯洁的冰雪运动容不得肮脏的政治算计。

在奥运会前向联大提交奥林匹克休战决议，本是一项良好传统。但这一次，美国、澳大利亚等个别国家却选择不签署该协议，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12月6日，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将不派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并引来“五眼联盟”其他4个成员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的“跟风”。英国更是上演了自我矛盾的讽刺一幕——首相约翰逊12月8日称，“抵制”体育运动是不明智的，但英国内阁各大臣无计划出席北京冬奥会。英国《独立报》网站刊文批评说，扰乱北京冬奥会不仅在政治上将适得其反，对体育运动也有害。

谈及这些不和谐声音背后的逻辑，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长陈向阳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这暴露出了有关国家和媒体的阴暗心理和狭隘心胸，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对中国的良好发展态势“羡慕嫉妒恨”。他们的做派，出于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偏见，出于吹毛求疵的心理。少数西方国家的“病根”在于其见不得中国好、唯恐中国强大的偏执心态，出于对自身发展走势越来越不自信的失落感，以及一种“你赢我输”的零和思维。

陈向阳注意到，正是那些以“民主国家”自诩的少数国家，成了此次在奥林匹克和体育运动上搞政治作秀的操盘手。在陈向阳看来，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这些国家的有关行为根本影响不了北京冬奥会，只能败坏这些国家自己的国际形象，影响他们与中国的关系。

对于美国政府作出有关决定的时间点，陈向阳认为，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后美国宣布相关决定影响恶劣，严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美国作为始作俑者引来少数国家跟风作秀，也暴露了美国政府对华遏制打压政策的错误本性、言行不一的两面性和拉帮结派围堵中国的阴险性。

对于相关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多次在回应中表示，由于中方原本就没有向相关国家发出邀请，他们的表态不过是政治炒作。他们的官员来或不来，丝毫不会影响北京冬奥会的精彩成功。西班牙《体育世界报》网站也在报道中直言，美国政府作出的所谓“政治姿态”不会影响北京冬奥会的举办。

事实确实如此。“五眼联盟”惜北京冬奥会搞政治表演，最终沦为美国和其少数追随者的“圈地自嗨”。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发声表示，法国没有计划加入美国对北京冬奥会的“行动”，认为此举“毫无意义”。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韩国总统文在寅更是在访问澳大利亚与澳总理莫里森共见记者时公开表态说，韩方没有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的想法。在立陶宛，对于有议员呼吁在冬奥会问题上追随美国，立陶宛奥委会公开发表声明说，奥运会属于全世界，以政治原因要求运动员放弃参赛不公平。

陈向阳指出，“美国此举很不得人心。蓄意将北京冬奥会政治化的只是极少数美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国家是头脑清醒的。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力主办冬奥会，是信守国际承诺和为人类加油鼓劲的正义之举。”

“人权”不是国际关系中的一张牌

美国等个别国家不派政府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的理由，据称是“中国新疆等地存在‘侵犯人权’问题”。对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相此前已明确作出回应：美国拿所谓“新疆人权问题”说事完全是自找没趣。

对于美西方个别国家用“人权牌”扰乱体育运动，英国广播公司（BBC）12月15日在报道中直言，“这不是一个新策略”。报道称，2018年，美欧曾以“纳瓦利内事件”为由，试图阻止俄罗斯举办世界杯足球赛。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时，美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也曾就“西藏人权”议题大肆炒作。当北京冬奥会即将举办时，美国等个别西方国家如法炮制，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怀揣梦想的运动员才是冬奥会的真正主角。据北京冬奥组委统计数据，截至11月17日，来自欧洲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奥委会，已提交1.4万多条注册申请，仅美国奥委会就提交了1528条。据报道，刚满20岁的新西兰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尼克·波迪亚斯，是冬奥奖牌的有力争夺者，他期待在北京冬奥会上再创佳绩。以色列一对兄妹正在父亲的指导下加紧训练，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项目做准备。来自西非国家冈比亚的阿马杜·克鲁巴利，正在为实现他的冬奥梦想奔走筹款，这位29岁的钢架雪车运动员想成为这个亚热带国家的首位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俄罗斯《苏维埃体育报》网站曾刊发斯洛伐克高山滑雪世界冠军维洛霍娃致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北京冬奥会是重回正常世界的一步”。

《奥林匹克宪章》明确指出，“体育运动是一项人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将奥运会政治化的言行，不仅是对运动员人权的破坏，更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亵渎。在12月11日闭幕的奥林匹克峰会上，作为奥运会的管理者，国际奥委会发布公告，对任何将奥运会和体育运动政治化的行为表示坚决反对。国际奥委会高级委员、前副主席理查德·庞德力挺中国表示：“从奥运会的角度来看，（如果）需要一个可以组织和举办出色奥运会的东道国，选择中国绝对没有错。”连美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莎拉-赫希兰德也发声说，任何扰乱奥运会的行动都不是国际政治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它将对运动员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陈向阳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也提醒说，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的这段时间里，美国等个别国家的一些人，仍可能继续拿冬奥会做文章，比如抹黑北京冬奥会的成功，怂恿其他国家跟风不派官员出席冬奥会，通过对体育赞助商施压等方式限制北京冬奥会的国际影响，等等。对此，中方既要全力以赴办好北京冬奥会，同时也要加强“冬奥外交”，讲好中外运动员团结拼搏、争创佳绩的北京冬奥故事，主动塑造涉奥国际舆论环境，激浊扬清、正本清源。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有一句名言：“体育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它能鼓舞人心，它能团结人们，它的力量无可取代。”今年夏季，延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巴赫将其比喻为“黑暗隧道尽头的一束光”。今年11月，休斯敦世乒赛上中美跨国混双组合出战，向世界展示了“乒乓外交”的延续。对于体育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知名奥林匹克学者易剑东曾撰文表示：“体育作为国际通用语言，恰恰可能成为政治体之间最好的交往桥梁。”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北京冬奥会弥足珍贵、殊为不易。应在加强防疫的同时，增进各国参赛选手的友谊，对外做好精彩赛事的转播，为世人加油打气，为寒冬增添暖意，为动荡变革期的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陈向阳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年轻人包括运动员应正确认识体育和政治的关系，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弘扬奥林匹克精神，鼓励各国青年在赛事内外加强交流、共同进步。

本报北京12月15日电

布林肯出访东南亚前夕 国际学者批评美国将人权“武器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子倩

12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展开他上任以来对东南亚地区的首次访问。布林肯此访为期4天，除印尼外，他还将访问马来西亚和泰国。这是继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之后，近一个多月来美国官员第三次造访东南亚。分析普遍认为，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日益密切，拜登政府试图通过频繁派遣官员访问东南亚等方式拉拢更多盟友，在“印太地区”建立“反华阵线”，逼迫有关国家在中美之间作选择。对此，包括媒体和学者在内的国际社会各界看得很清楚，也对美方在人权、民主方面的言行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对于美国通过拉帮结派、制造对立遏制中国的意图，东南亚国家似乎并不愿配合。印尼《国际日报》12月13日发表评论文章直言，美国突然如此积极地重新联络东南亚，只是为了满足其政治内斗的需要。东盟国家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他们的对华政策不可能被美国政府左右。

有意思的是，虽然多家美媒在报道中暗示，布林肯此访东南亚仍将把“共同价值观”、涉华“人权”等话题带入讨论范围，炒作强化地区安全建设以“应对中国的霸凌”，但是，在刚刚惨淡收场的所谓“民主峰会”上，美国仅邀请了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这三个东南亚地区国家参加，马来西亚最终没有出席。

在所谓“民主峰会”匆匆闭幕之后，布林肯出访东南亚前夕，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和中国智库经士智库12月12日共同举办了一场以“民主、人权和大国竞争对话”为主题的线上对话会。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琦（Koh King Kee）在对话会上坦言：“美国现在通过指责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公然将人权问题武器化，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破坏新疆稳定的计划，目的是为了追求美国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也是美国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许庆琦表示，“民主”的定义和解释权，长期以来一直被西方垄断。西方一直向世界灌输“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等观念，然而，绝大多数人在这些系统中并不掌握权力。他指出：“民主是为所有公民带来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主不应只存在于形式上。人权也是如此。人权关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政策和措施，不应是口号和空话。”

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联席所长盖尔·拉夫特对许庆琦的观点表示赞同。拉夫特说，“民主是一种政治形式。政府角色应是给予人民美好的生活和安全感，是让人们夜晚走在大街上不用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从这个角度看，美国试图以霸权垄断民主话语权、高调炒作自己“民主灯塔”的人设，显得极为讽刺。据《今日美国报》对美国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汇总数据的分析报道，2020年美国共发生611起造成4人及以上伤亡的严重枪击案，创下历史新高，较2019年激增47%。今年以来，美国枪击案仍呈持续增加态势，学生和教师已被迫习惯于演练如何应对枪支袭击。

拉夫特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场景——新冠肺炎疫情。在他看来，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一次有机会让不同国家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展示他们如何照顾自己的人民。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些所谓“民主国家”的表现非常糟糕。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2月14日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5000万例，近80万美国人因新冠肺炎疫情丧命。在冰冷数据的背后，是自疫情暴发初期就层出不穷的反科学言论、两党扯皮对立等种种病毒“催化剂”，这些因素仍在持续侵害美国人民的生命。拉夫特发问：“美国政府是真的关心民主和人权吗？”

斯里兰卡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加纳什·科伦伯格表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适合本国的治理体系。世界各国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共同威胁，各国应该团结起来。他坦言：“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正在制造分裂。我们不需要排外的‘俱乐部’”。

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是在结束七国集团（G7）外长会后立即开启东南亚之行的，而东盟各国首次受邀参加了这次七国集团外长会，会议重点议题也被认为是讨论“对抗中俄威胁”。东盟被西方视为“对华竞争的关键”，路透社评论称，七国集团成员国等西方国家拉拢东南亚国家的目的显而易见，美国要将七国集团打造成“反华俱乐部”。

本报北京12月15日电

“大辞职”潮中的美国年轻人 “躺平”还是“美国梦”已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继“大萧条”“大衰退”之后，又一个新词被写入了词典。美国得州农工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安东尼·克鲁兹创造的“大辞职”（Great Resignation）一词，在社会上迅速引起共鸣，成为美国2021年年度热词。

在“大辞职”浪潮中，美国年轻人成了绝对的主力军。对他们而言，通过个人奋斗获得对等回报的“美国梦”早已变了样。迫于种种压力，他们对未来有着更实际的认识和期待。

除去通胀因素，美国人薪资实际一直在下降

所谓“大辞职”，是指美国从2021年上半年开始的员工大规模主动辞职浪潮。今年4月，美国有400万人辞职，是去年同期辞职人数的两倍，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7月、8月、9月又打破上月纪录，到9月时辞职人数已达440万，空缺工作岗位达1040万个。这是美国过去20年从未经历的事情。

超市和商场高峰期的收银台前排起的长队，物流公司和港口堆积如山的货物，商店门口张贴的招聘启事，都印证了“大辞职”的存在。一家甜甜圈店的窗户上贴着告示：“今天我们人手不够。如果你没有耐心（等候）的话，就来应聘吧。”另一家店铺紧闭大门上的告示写道：“抱歉，我们没有员工，现在没人工作了。当然，我们也不是好雇主，只发最低工资，没有任何福利。但这一切都是政府的错。”

辞职潮让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地陷入党派之争。共和党多次指责说，联邦政府提供失业补助是“高福利养懒汉”，遏制了人们重回就业市场的意愿。民主党则辩称，高昂的托儿费、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恐惧才是导致人力短缺的罪魁祸首，因为联邦失业补助到9月就已结束了，但辞职潮仍然没有减缓的迹象。

《商业内幕》指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忽略了一个或许最简单的事实：美国人早已厌倦了增长低于“标准”的工资待遇。

过去50年里，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美国人的薪资收入实际上一直在下降。1969年，美国人的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例为51.6%，此后逐渐递减，到2019年跌至43.4%。换句话说，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者从国家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好处越来越少。此外，越来越多的外包和零工工作让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没有出台对带薪休假的保障性政策，无论是怀孕还是接种新冠疫苗，员工能否休假完全取决于雇主的心情。

多年来，美国劳动力市场一直是买方市场，雇主拥有绝对话语权。然而，截至今年9月底，美国每100个岗位对应75个不在岗员工，劳动力市场开始朝向卖方市场转变。为了填补巨大的岗位缺口，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得不提高待遇。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美国第三季度平均工资上涨了1.5%，涨幅为20年来最高。求职者第一次占了上风，在薪资、福利、工作时长等方面有了更大的议价能力。

年轻人是“大辞职”的主力军

“‘大辞职’的背后其实是‘大不满’。”盖洛普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导致辞职潮的除了收入待遇，还有更深层次原因。疫情改变了工作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工作的看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工作对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自己想从工作中获得什么？

这或许正是思维活跃的年轻人成为“大辞职”主力军的原因之一。据调查，在18岁至39岁的受访者中，27%的人在过去一年中炒过老板鱿鱼，在18岁至25岁的年轻人（即“Z世代”）中，这一比例高达54%。被问及为什么辞职时，“工作不利于我的心理健康”和“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失去了平衡”，是最常见的两个答案。

许多研究者在分析年轻人辞职潮现象时，都提到了“倦怠”这个词。青年调查机构“Ypulse”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8岁至39岁人群中，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因工作感到“身心疲惫”。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一些行业尤其是服务业比以往任何时候的要求都更高；另一方面，把工作从办公室搬到家里，在很多年轻人看来意味着工作和生活之间没有明确界限，雇主对员工“一直待机”的期望也会水涨船高。远程办公带来的“数字化倦怠”，对一些刚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个挑战。领英编辑乔治·安德斯在调查报告中指出，“他们很难找到自己（在社会组织中）的位置，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正常情况下的入职、社交和培训过程。”还有一种说法是，一线劳动者和低收入劳动者辞职的可能性远大于拿着高薪的办公室白领，而年轻人的收入在各年龄段劳动者中是最低的。

数字市场经理帕特里夏·迪亚兹在领英上发表的帖子，则道出了美国年轻一代对社会的失望，为当下的辞职潮现象提供了部分答案：“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两架飞机撞向大楼；进入大学后，我们的同龄人为一场毫无必要的战争上了战场；毕业时，我们背负着沉重的学生贷款债务；在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我们进入了就业市场。我们目睹了无辜的人在社交媒体的直播中死去；我们已经被（节节攀升的）房价打败；当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进入第二个年头，我们又不得不在自己的健康和所爱的人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我们早已疲惫不堪。辞职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有分析指出，实际上，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之前，由于经济衰退、气候变化等问题，美国年轻人就普遍感到“倦怠”。

“美国梦”涵义已发生颠覆性转变

“‘大辞职’的背后，并不是人们不愿意工作。它标志着一种思想的觉醒——在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国梦’已死。”《思想的瓦解》一书作者、《纽约时报》作家库尔特·艾肯瓦尔德在推特上写道。

“美国梦”一词是作家兼历史学家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在其著作《美国史诗》中提出的。根据亚当斯的说法，“美国梦”应当“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或成就赋予其机会，使其过上更美好、更丰富、更充实的生活”，无论其社会阶层或出生环境如何。在上一代美国人看来，一份稳定而高薪的工作、一套宽敞的房子、一辆好车、两个以上孩子，是“美国梦”的标配和人生成功的标志。

但在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观念里，“美国梦”的涵义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大西洋月刊》曾作过一项调查：1996年，美国中西部某州一名高中生表示，“许多出身贫寒或者遭遇困境的人，都靠个人不懈努力走上了人生巅峰……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但能成功的大有人在”；2011年，在同一个州对高中生群体进行的同样调查中，一名学生表示，“你可以不懈努力，但如果你没机会或者没钱继续学业，你就永远没有机会逃离现在的处境”。

年轻人对财富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1996年，受访者认为财富并不是通往幸福的门票，财富的匮乏甚至有助于品格的塑造。到2011年，受访者普遍认为财富能让人幸福，因为能给他们带来物质，也能让他们得到同龄人的尊重和关注。

研究者卡罗尔·霍斯泰特称之为“美国梦2.0版”：“在这个版本的‘美国梦’中，任何人都可以上大学，前提是他们要有资源，愿意举债，能以任何方式获得奖学金，愿意接受社区大学，或者来自富裕家庭。”更悲观地说，年轻人已不再相信“美国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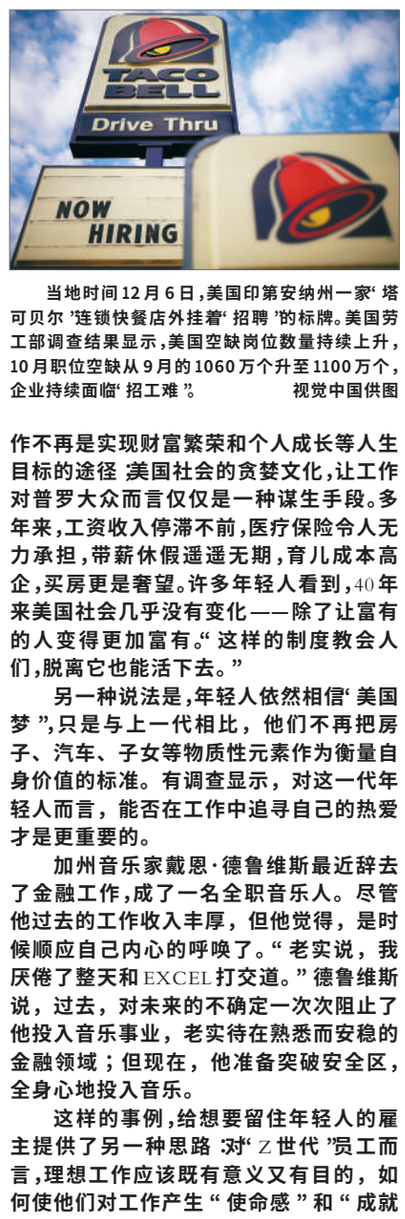
艾肯瓦尔德也指出，对年轻人来说，工作不再是实现财富繁荣和个人成长等人生目标的途径，美国社会的贪婪文化，让工作对普罗大众而言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多年来，工资收入停滞不前，医疗保险令人无力承担，带薪休假遥遥无期，育儿成本高企，买房更是奢望。许多年轻人看到，40年来美国社会几乎没有变化——除了让富有的人变得更加富有。“这样的制度教会人们，脱离它也能活下去。”

另一种说法是，年轻人依然相信“美国梦”，只是与上一代相比，他们不再把房子、汽车、子女等物质性元素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有调查显示，对这一代年轻人而言，能否在工作中追寻自己的热爱才是更重要的。

加州音乐家戴恩·德鲁维斯最近辞去了金融工作，成了一名全职音乐人。尽管他过去的工作收入丰厚，但他觉得，是时候顺应自己内心的呼唤了。“老实说，我厌倦了整天和EXCEL打交道。”德鲁维斯说，过去，对未来的不确定一次次阻止了他投入音乐事业，老实待在熟悉而安稳的金融领域；但现在，他准备突破安全区，全身心地投入音乐。

这样的事例，给想要留住年轻人的雇主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对“Z世代”员工而言，理想工作应该既有意义又有目的，如何使他们对工作产生“使命感”和“成就感”，是留住他们的关键。正如领英首席执行官瑞安·罗斯兰斯基所言：“‘大辞职’不仅仅涉及工作的方式，还涉及工作的意义——这是雇主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报北京12月15日电



当地时间12月6日，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家“塔可贝尔”连锁快餐店外挂着“招聘”的标牌。美国劳工部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空缺岗位数量持续上升，10月职位空缺从9月的1060万个升至1100万个，企业持续面临“招工难”。 视觉中国供图